

张友渔

政治学论著

段荣奎 王云璈 编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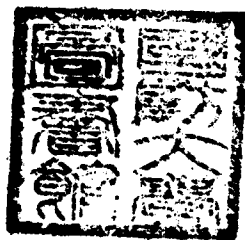
张 友 渔

政治学论著

段 荣 奎 编
王 云 琨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1989年·10月





张友渔政治学论著

段荣奎 王云琨 编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河北涿州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9.75 字数: 243 千
1989年11月北京第1版 1989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2,500册

ISBN7—80078—004—×10.04

定价: 4.60元

张友渔著作编辑委员会

主编 陈荷夫

编委 (按姓氏笔划为序)

丁守和	马良春	王迪	王云璠
刘兆兴	朱崇利	吴大英	陈荷夫
肖平	段荣奎	赵蓉裳	侯雨夫
高德	程文	鲁孝文	

前 言

自1918年起，张友渔就开始从事社会科学的研究工作，为当时报刊撰写文章，抨击时弊。1927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后，在跟北洋军阀、国民党反动统治斗争的岁月里，他以进步报人和教授的身份，口诛笔伐，又写了许多优秀文章，并以诗歌、杂文为匕首向反动派攻击。七十年来，他的著作是相当丰富多采的。全部作品估计近一千万言。

张友渔著作的编纂工作数年前即已开始。198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决定编辑出版《张友渔文集》。为了更好地进行准备，从1985年下半年起，就着手搜集散见于过去报纸杂志上的作品。由于年代久远，搜集工作是困难的。经各方面同志的大力协助，基本上得以找齐，并分门别类地加以抄印、整理和编纂。经过有关学者专家的努力，除核校已由群众出版社出版的《宪法论丛》一书外，另编出《法学论著》（吴大英、刘兆兴编）、《张友渔新闻学论文选》（王迪编）、《张友渔社论、通信、杂文选》（王迪编）、《日本问题和国际问题》（程文编）、《抗日战争时期的国际风云》（朱崇利、高德编）、《政治学论著》（段荣奎、王云琨编）、《历史与现实》（丁守和、侯雨夫编）、《张友渔诗文集》（马良春编）、《张友渔回忆录》（陈荷夫编）等九个集子。

这些学者在编辑张友渔著作时，采取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筛选其中至今仍有出版价值的作品。在蒐集选编和出版过程中，

601.572

得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的大力支持与帮助。

张友渔著作编辑委员会

一九八八年二月

目 录

大张挞伐呢？检讨国策呢？	(1)
我们需要怎样的民主政治	(8)
劳动节在今日的意义	(13)
关于“诋毁之首”	(15)
北京市的整编工作	(17)
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做好1958年的选举工作	(25)
积极开展政治学的研究	
——在中国政治学会筹备会上的讲话	(44)
在中国政治学会成立大会上的开幕词(1980年12月24日)	(48)
《政治与政治科学》代序	(53)
在上海市政治学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	(59)
在法学所、政治学所汇报会上的谈话要点	(71)
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和中国的实践	
——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	(74)
为开创政治学研究工作的新局面而努力	
——在中国政治学会第二次学术讨论会上的讲话	(91)
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学体系	(108)
论我国行政机关的首长负责制	(112)
论我国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特征	(127)
只要有阶级斗争就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	(142)
在全国行政科学学术讨论会上的开幕词	(145)

政社分开建立乡政权的必要性·····	(148)
关于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任务、地位、职权和生活方式 的问题·····	(151)
关于中国的地方分权问题 ——1984年12月在国际宪法学协会圆桌会议上的发 言·····	(165)
中国政治学的兴起 ——代发刊词·····	(172)
在中国政治学会第二次代表大会暨学术讨论会 上的开幕词·····	(177)
加强地方政权建设 推动经济体制改革 ——祝地方政权建设理论讨论会获得圆满成功·····	(182)
积极推进中国政治学的发展·····	(185)
关于政治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188)
中国政治学的发展有广阔前景·····	(191)
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	(195)
十年京兆·····	(197)
十年京兆(二)·····	(210)
政治体制改革和党政分工·····	(240)
关于政治体制改革和地方人大常委会工作的问题·····	(243)
不应盲目崇拜资产阶级民主 ——就民主政治问题答记者问·····	(259)
不能模仿资产阶级的三权分立·····	(261)
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	(264)
坚持人民民主专政·····	(274)
理论应当去说明具体问题·····	(278)
党政分开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	(280)
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	(282)

在中央办公厅讨论十三大报告稿

征求意见座谈会上的发言提纲·····	(285)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社会科学理论工作者的任务·····	(290)
政治体制改革和政府法制工作问题·····	(295)

大张挾伐呢？检讨国策呢？

一

自蒋委员长返京，陕变告一段落，全国民众莫不引为幸事。乃最近因中央仍要贯彻“既定的国策”，致惹起杨虎城们的激烈的反对，而关西战云，又复弥漫，我们所忧虑的“更大事变”，竟不幸而真个要实现了！这实在是国家民族的大不幸！不仅象我们在本刊前期所说“使陕变的和平解决，减少了它的意义”，简直使它根本变成“无意义”了，所幸直到现在为止，蒋委员长还是“一本和平初衷”，“希望和平解决”（北平晨报本月13日及14日要闻版），我们切盼他不仅是“希望和平解决”，并且能等“有万全之策”（北平晨报本月14日要闻版）！当蒋委员长留居西安的时候，人们所以十分焦虑，竭力营救，不是因为：“蒋委员长一身系国家之安危”吗？那么，反过来说，国家的安危也就和蒋委员长的行动大有关系了。现在：蒋委员长“一身”是由“危”而“安”了，但国家却遭逢着正在酝酿，寻将爆发的内战的危机！蒋委员长似乎不会优游林泉，避免责任；而将抱着负责精神，“一本和平初衷”，以挽救这一危机。等到这篇东西和读者相见时，也许弥漫着的战云，已经消散净尽了！那是我们所十二万分盼祷着的！

二

有人说，中央政府的命令，任何人都应该绝对服从。杨虎城们现在既违抗命令，便当大张挾伐，哪有通融的余地？中央对于杨虎城们，纵有军事行动，也只是“讨伐”，而不是“内战”。是的，中央和疆吏，不能等量齐观，中央对疆吏的军事行动，依

儒家“正名”的说法，是“征”而不是“伐”。然而这只是机械的看法，处常的态度，而不是应付现在的非常时期和非常事变的有效办法。记得当蒋委员长还未返京的时候，韩向方，宋明轩二将军曾发出通电，呼吁和平。电文中说：

“目前急务，约有三大原则：第一，如何维持国家命脉？第二，如何避免人民涂炭？第三，如何保护领袖安全，以上三义，夙夜徘徊。窃维处穷处变之道，过与处经处常不一。似宜尽量采取沉毅与静耐，以求政治妥善通适之解决。设趋极端断然之途径，则上列三义，恐难兼顾，或演至兵连祸结，不堪收拾之时，虽有任何巨大之代价，不复弥补挽救此种空间之损失。”（北平晨报12月24日要闻版）

这的确是通达妥当的见解。“处穷处变之道”，究竟和“处经处常不一”，必欲以中央政府的命令，任何人都应绝对服从的死原则，处理这非常时期的非常事变，则必演成“兵连祸结，不堪收拾”！不论是“征”也罢，“伐”也罢，“讨伐”也罢，“内战”也罢；对于国家民族，究有什么益处呢？但是我们并不是说，因为是在非常时期，便任何人都可违抗中央的命令；更不是，中央的任何命令，都不应该强人服从。只是说，中央的命令不一定是一切具有绝对的最高的效力；在它的上面，还有衡量它的价值的更高的原则。——所谓更高的原则，不外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以保障国家生存，实现民族解放。中央的命令果不悖于这一原则，当然，任何人都应服从；否则任何人都可以唱异议。杨虎城们并不是汉奸，他们的行动并不是卖国，这是任何人都应该承认的。——除非你把一切不完全服从中央命令的人都指为卖国的汉奸，你才能说他们也是卖国的汉奸。此次陕变的爆发，以及最近杨虎城们的违抗中央命令，据他们的表示，不外是不满意中央的政策；而要求中央接受他们的八项主张，——（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二）停止一切内战立

即对外抗战，（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爱国领袖，（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六）保障人民言论集会结社之一切政治自由，（七）确实遵行总理遗嘱，（八）立即召开救亡会议，（据12月27日日文东京朝日新闻）。——这些要求，是不是为全国民众所完全赞同？是不是可以代表全国民众的一致意见，我们不愿武断地断定。但有一点，可以相信，即他们所以提出这些要求，决不是仅凭个人的主观见解，而是根据着客观需要。中央如不能使这种客观需要消灭，而仅以武力，迫使人们服从命令，实在不是可以获得最后良效的妥当办法。

三

李宗仁将军在本月一日东方杂志新年特大号所发表的民族复兴与焦土抗日一文中，曾有这么一段话：

“溯自九一八国难发生以来，为时已五年有半，于此悠久之岁月中，吾人所得之惨痛历史教训为何？一言以蔽之曰，不抵抗论为一切民族危机之厉阶耳。……盖在不抵抗论之下，国家领土主权之丧失，已达三分之一，人民之被割裂，已达五分之一，而民族精神上与国民人格上，所蒙受之损害，则更不可以数计。是不抵抗论一日不放弃，恐中华民族将无解放之一日，更无复兴之一日！……”

“夷考此种不抵抗论之产生，不外基于下列各种观点。……第四，认为中国内部尚未臻于统一，共匪尚未肃清，实不能与日本作战，必须俟内部彻底安定，然后始能对外。……”

“九一八事变以还，中国政局早经统一，其所以未臻精神上之团结一致者，徒以对日政策未能举国一致耳。共匪问题，纯为国民经济破产之象征。中国一日在日本军阀铁蹄之下，中国国民经济，即一日不能健全发展，国民经济一日不能健全发展，共匪问题即一日不能肃清。吾人以为欲完成中国实质上之统一，必须

首先发动举国一致之抗战，欲彻底肃清共匪，尤必须首先解除日本所加于中国国民经济之损害。质言之，即必须以抗日为达到统一及彻底肃清共匪之先决条件耳。”

可见九一八以来的不抵抗政策乃至所谓“先安内后攘外”的政策，不仅为张学良杨虎城们所不满，并且也为李宗仁将军所不满；又不仅为李宗仁将军所不满，恐怕像我们前此所屡屡提到，

“在他们以外，还大有人在呢”！事实上，十九路军在上海自动的抗战，冯玉祥在张家口树起抗日的旗帜，陈铭枢们在福建建立所谓人民政府，以及去年夏天的两广事变，何莫非不满意中央政策的表现？人民政府成立时所发表的人民权利宣言，首先痛诋中央政府，“公然且积极地勾结日本帝国主义，出卖国家，惨杀人民……”（据日文外交时报697号），其后，在第二次宣言里，又说：“本政府成立以来，南京××集团，指本政府为容共联日，然而彼等实卖国，事仇，残害人民而制造共匪。”去年夏天两广事变爆发后，西南执行部和西南政务委员会的通电，曾要求：“中央毅然决意抗敌，以至诚领导全国，实行抵抗，而争最后胜利”。李宗仁将军们也通电响应说：

“九一八事变以来，日本凭恃暴力，蔑视一切国际信义，破坏一切国际条约，掠夺我领土，惨杀我国民，侵犯我主权，危害我国家，侮辱我民族，已五年于兹矣。而我政府籍隐忍之名，甘受未曾有之耻辱，以希求万一之和平。焉知我之忍辱已达极点，而敌之凶狂曾无止境。……呜呼！寇氛已入腹心，危亡迫在眉睫，今在奋起抗敌之外，已别无他途矣！”（据日文东亚第9卷第12号）。

这些，都证明一切反对政府的运动，不外是不满中央政策尤其对日政策的表现。固然，我们不能断定这些宣言和通电，都是由衷之言；这些运动的真正动机，不是别有企图。但他们既公然把不满意中央的政策，做为发难的理由，则客观上必有拥护这一

理由的群众存在着，不然，他们又何必拿它作号召呢？所以中央的政策如不能有所修正或变更，则反对政府的运动，也不能根本消灭。两广事变，解决未久，而西安事变又爆发了。事变爆发后，张学良、杨虎城们所提出的理由，如前所述，也是不满意中央的政策，要求实现他们的主张。最近，杨虎城们违抗中央命令的理由，还是：

“此间主张，始终惟在抗日。主张一日不实现，虎城等即一日不能放弃其要求。歌电所示人事办法及部队部署，远非抗日本意。此间全体官兵以汉公被留，愤激万分。中央如始终不肯开诚，则此间亦殊难为中央维持威信，”（1月10日北平晨报要闻版）。那么，西安事变，纵在中央武力压迫之下，勉强解决，谁能担保再没有其他事变继之而起呢？

四

蒋委员长这次在西安，对张学良杨虎城们所提出的八项主张，究竟表示什么态度？我们没有躬与其事，当然不能确切知道。据杨虎城对外国记者表示，蒋委员长曾经采纳他们的意见。他说：

“蒋委员长深思熟虑两礼拜后，遂承认了我们的全部主张，因此，我西北将领为实现全国抗日统一战线计，故同意护送蒋委员长返京。”（1月5日日文东京朝日新闻）。

本月5日，他们所发出的歌电，也说蒋委员长已采纳他们的要求，并向他们表示：“我在一日，决不使中国再起内战”。另据日本同盟社消息，谓西安事变的妥协条件如左：

“（一）恢复蒋委员长自由和保障张学良安全；（二）蒋委员长赞成抗日，但因实现抗日，需要若干准备，故先谋接近英美俄法；（三）不明白表示和共产党合作，但是停止剿共；（四）补发东北军和杨虎城军的欠饷一千万元。（五）罢免中央要人中

之亲日派；（六）对于在上海拘禁的陈金树（？）等六人，减刑或释放；（七）张学良关于蒋委员长在西安的日记内容，确守秘密；（八）撤回关于讨伐张学良等的一切措置，恢复事变前的状态。”（1月8日日文京津日日新闻）。

这些条件的内容，是否确实？以及蒋委员长是否承认？当然，都还是问题。据1月9日日文京津日日新闻载上海电，谓：“南京政府认为所谓妥协条件，是张学良方面的宣传；同时，强硬派则谓所谓妥协条件，是宋子文、张学良和杨虎城三人之间成立谅解，和南京政府毫无干涉。”观蒋委员长在他所发表的对张学良杨虎城训话中，特别提到：“尔等不再强求我有任何签字与下令之非分举动，亦并无何等特殊之要求”，似可相信他并没有签字于所谓妥协条件。但在同一训话中，又特别说到：“余向来所自勉者，即言必信，行必果二语。凡与国家民族有利益者，决不有丝毫自私之心，且无不可以采纳，亦无不可以实行。……中央必仍本爱惜国力之精神，自有妥善处置，以挽国家之危机也。”（12月27日北平晨报要闻版），则又似乎暗示采纳张学良们的意见。又观蒋委员长始终没有提到张学良杨虎城们“屡次求他签字和下令”的事实是什么；也没有对张学良杨虎城们的政治主张，批评一句，可知他纵然没有正式承认他们的要求，采纳他们的主张，也未必不认为是值得考虑的。而宋子文氏代表蒋委员长（不论是否得到同意）签字于所谓妥协条件，则恐怕是事实。不然，张学良杨虎城们当不会很迅速地护送蒋委员长返京。在这样的形势下，究应因为杨虎城违抗命令，而便大张挞伐呢？还是应该检讨中央的政策呢？

不论蒋委员长是否接受张学良杨虎城们的主张，也不论宋子文是否签字于所谓妥协条件，但杨虎城们坚持着贯彻他们的主张的意思，则是事实。在所谓歌电里，曾有“起而周旋，至死无悔”之语，（1月14日实报）如果中央必欲以武力压迫他们，而

期贯彻“既定国策”，则兵连祸结，势所难免，不仅西班牙的残酷内战再演于中国，而且亡国灭种之祸，亦将随之而至了！杨虎城们纵然违抗中央命令，但终还不像殷汝耕，德王之流，公然叛国，何至不能予以宽容，而必欲大张挞伐？若谓违抗中央命令，便应讨伐，则应该讨伐的人，不仅是杨虎城们罢？应该讨伐的地域，不仅是西北罢？讨伐的军事，也不应该等到现在才开始罢？李宗仁将军和刘湘将军们，近电中央，主张对陕甘事，采和平手段，从大处着眼，期弥患于无形，而培护国家之实力。这实在是妥当的主张。我们希望中央能够采纳，各方能够响应。尤其韩向方和宋明轩二将军，前此既为呼吁和平，提出二大原则。现在已实现了的，仅仅是“如何保护领袖安全？”的一原则；而“如何维持国家命脉？”及“如何避免人民涂炭？”两个原则，又将被破坏了！似乎应该再有所表示了罢？至于蒋委员长本文既始终“希望和平解决”，自不待我们来请求与劝告。我们只和李宗仁将军们同样，请他“即日销假返京，主持大计”，勿任感情用事或别有作用的人们，把事弄糟。国人既拥戴蒋委员长为以一身系国家安危的唯一领袖，则蒋委员长对于国家的安危，便应毅然负起责任，不应该一切推给中央。——如果一切都由中央负责，一切都由中央决定，蒋委员长毫无作用，则我们只拥护中央便够了，又何必特别拥护蒋委员长为唯一的领袖呢？

最后，我们要郑重地向全国民众警告：目前中国的危机，依然十二万分严重。对外抗战呢？还是对外屈服呢？消弭内战呢？还是发动内战呢？一切都未决定，双方都有可能。各种不同的政治力量，正在明争暗斗着，帝国主义者也正在背后策动着。我们不容得极，不能沉默，更不可抱着乐观与幻想，期待着没有把握的前途，而应该以伟大的大众力量，促现“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以保障国家生存、实现民族解放”的最高原则。只有民众的力量，是真正的力量，只有民众的力量，可以决定国家的命运。

如民众不能用自身的力量，而只坐待少数人去救国，则其结果，或至失望。因为这些少数人，未必始终可靠，一离开了民众的力量，便会变得动摇，怯懦，乃至背叛民族，出卖国家！

1937年1月14日

原载1937年1月17日《时代文化》第1卷第5号

我们需要怎样的民主政治

在中国，目前没有人敢公然反对民主政治。因为中国需要实现民主政治不仅是广大民众所要求，而且为友邦人士所期望。那些一向鼓吹法西斯主义，诋毁民主政治的人们在这样的内外压力之下，特别是友邦的压力之下，也不得不把民主政治当做口头禅了。

然而他们决不是翻然悔悟，真正鄙弃专制主义而拥护民主政治。他们是要把民主政治的外衣掩蔽专制主义的丑相，即国父中山先生所曾指摘的“假民治之名而行专制之实。”他们说，中国已经实现民主政治。一党专政就是民主政治。这是有组织的民主政治，是最新式的民主政治，是适合中国国情的民主政治。因此，民众不必再要求什么民主政治，而友邦也不必怀疑中国不是民主国家了。实际，“挂羊头卖狗肉”的把戏，决不能骗人到底。生活在实际政治之下，受着实际政治的影响的广大民众是会清清楚楚地了解这是不是民主政治。中国不需要民主政治则已，既需要民主政治那就必须拿出货真价实的民主政治。不能把民主其名，专制其实的赝品来混充。

那么，我们需要怎样的民主政治呢？原则上说，就是汉奸，亲日派除外的全民政治。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曾说：“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若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